



評論
tb

亞運屢創佳績，香港體育憑什麼跑出來？

第20屆亞運會落幕，中國香港代表團以11金19銀24銅、合共54面獎牌的成績位列獎牌榜第九，無論金牌數量還是總獎牌數，都再度刷新紀錄。只有700多萬人口的香港，何以能在群雄並立的亞洲體壇表現亮眼？其實這並非偶然的爆發，而是多重優勢長期累積下的結果：是特區政府長期且制度化的政策支持，是香港獨有的「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」的平台紅利，是以賽馬會為代表的民間力量的合力推動。若與同屬國際城市的新加坡作對照，更能體現香港體育發展的獨特優勢，亦能看清未來可以持續優化的方向。

與香港近年出色的亞運會成績相比，新加坡則呈現逐漸下降之勢。2006年多哈亞運會該國收穫歷來最多共8枚金牌，其後在廣州、仁川、雅加達和杭州亞運會的金牌數則分別為4枚、5枚、4枚和3枚，今年則只得2枚。這樣對比，並非在貶抑新加

坡，而從客觀角度觀察香港體育事業成功的原因，以為未來發展提供有用借鑒。

恆常投放資源強化配套

第一，特區政府長期穩定的政策鋪排與恆常資源投放，是香港體育不斷邁進的核心因素。多年以來，特區政府一直貫徹精英體育與普及體育並重的發展方針，透過制度建設取代過去零散、被動的支援模式，讓香港體育發展走向專業化與系統化。政府恆常資助香港體育學院，鞏固精英運動員的訓練體系，針對劍擊、網球、滑浪風帆、乒乓球、檯球等傳統強項持續深耕，同時積極培育武術、電競等新興潛力項目，逐步拓闊香港的獎牌爭奪版圖。

與此同時，政府持續強化運動科學、運動醫學、體能訓練與教練培訓的配套，讓運動員的備戰不再只依靠個人意志與經驗，而是以數據分析與科學訓練提升競爭實力。本地訓練設施不斷升級優化，也為長期集訓、封閉備戰提供穩定可靠的訓練

環境。反觀新加坡，同樣由政府主導精英體育發展，但當地發展思維更傾向精準挑選、集中資源重點扶持，全力培育少數明星運動員與熱門項目，以作個別項目突圍。特區政府的體育政策則更具延續性與包容性，不追求單一項目極致發展，而是搭建完整的體育生態，讓不同項目、不同年齡的運動員都有向上發展的空間，最終形成今屆亞運多點開花的亮眼局面。

第二，「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」的獨特定位，是香港最為珍貴、亦無法複製的體育發展優勢。近年來，香港運動員頻繁參與全國性賽事以及國家隊合練，在高水平對抗中累積經驗、提升技術實力。隨着大灣區體育融合不斷深化，三地訓練資源互通、賽事活動互動常態化，大幅拓寬了香港運動員的備戰場景與成長空間。與此同時，香港保持高度國際化的運作模式，緊貼國際賽事規則與全球體育資源，既能吸收內地扎實系統的訓練方法，亦能維持國際視野與靈活的參賽節奏。最直觀的例

子就是，香港既有來自內地一流的教練，也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教練。

新加坡雖然同樣擁有國際化優勢，對外交流便捷，但缺乏大國體育體系的堅實支撐。當地只能依靠自身有限的體育體制循環發展，人才儲備、訓練層次與資源厚度都存在天然局限。這也解釋了香港能夠實現多項目全面進步、新老選手接續湧現。

第三，以香港賽馬會為主的民間資源與社會力量，是港隊不斷突破成績上限的關鍵助力。政府負責制度搭建，馬會則提供更靈活、更貼近運動員實際需要的全方位支援，形成各方協力的良好格局。今屆亞運港隊創下歷史佳績，馬會便及時發放3750萬元對應獎勵，較上一屆多出500萬元。這既是對運動員刻苦付出的肯定，也向社會大眾重新塑造體育的專業價值，讓運動員職業得到更多認同與尊重，鼓勵更多年輕人追尋自己的體育夢想。除了馬會之外，本地眾多體育團體、學校與企業積極參與基層體育培育工作，校園賽事與社

區訓練穩定開展，層層搭建人才選拔階梯，為精英體育源源不斷輸送新血。

內聯外通打開發展上限

整體而言，2026年亞運的歷史性突破，充分彰顯香港獨特的體育發展優勢。政府制度化的資源投放，築牢體育長遠發展的穩固根基；內聯外通的平台優勢，打開了香港運動員的發展上限；馬會帶動的民間力量，為體育發展注入更大活力。相較其他地區側重小體系精準突圍的發展模式，香港當前的發展路徑，具備更強的可持續性與擴容潛力。

當然，體育運動是一項追求更高、更強的事業，沒有永遠的贏家也沒有永遠的輸家。但未來香港只要持續深化大灣區體育融合，優化運動員全周期保障機制，平衡精英賽事突破與全民體育普及，必定能夠延續上升勢頭，讓體育成為展現香港城市活力與「一國兩制」優勢的亮麗名片。

落實五年宏圖 堅守為民初心



陳克勤

議事廳

立法會昨日起一連三天合併辯論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。這是香港首次制定全面、系統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綱領，標誌香港在由治及興的道路上邁出歷史性一步。五年規劃將給市場、國際社會以及市民帶來更大信心，一個穩定、持續以及有預期的香港，必能發揮出自己的優勢，為投資者帶來機遇，為市民帶來更多的幸福感和獲得感。

規劃牢牢把握七大理念，筆者最為欣賞的，是規劃明確提出「堅持以民生為本，切實排解民生憂難」，將改善民生獨立成篇，把房屋、醫療、教育、就業、安老、青年發展等市民最關心的深層次民生訴求，放在優先位置，設定一系列可量化、可檢視的發展指標，讓宏大的藍圖落實到每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
規劃正面回應市民關切

民建聯數十年扎根社區、服務基層，深知香港市民最迫切的期盼，是能感受到實實在在的生活改善。例如，住在劏房的家庭期盼有安全、寬敞的居所；長者擔心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長、安老服務不足；年輕父母關心子女教育資源；青年關心就業、創業與置業機會；打工一族希望收入隨經濟同步增長、勞工保障更加完善。五年規劃正面回應了市民的關切。

房屋問題，是香港民生最大痛點，也是民建聯長年倡議優先處理的議題。高樓價、貴租金、公屋漫長輪候，壓在無數基層家庭肩負。五年規劃清晰提出，目標於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，同時持續增加公營房屋供應，縮短公屋輪候時間，建構多元安居體系。這不是遙遠的承諾，而是設定時間節點的

硬任務。只有解決安居難題，市民才能放下生活重擔，社會才有穩定發展的基礎。

醫療方面，隨着香港人口持續老化，公立醫院服務壓力日增，市民長期面對門診、手術輪候時間長的問題。規劃提出持續增加公立醫院病床、提升每千人口醫生數量，擴大地區康健中心覆蓋，推動基層醫療體系改革，建立預防為本的醫療服務模式。同時推動大灣區醫療「心聯通」，探索跨境醫療服務配套，方便市民在大灣區尋求合適醫療支援。期待有關改革循序推進，讓市民看病更方便、等候時間更短。

青年是香港的未來，規劃持續落實《青年發展藍圖》，在學業、就業、創業、置業多方面給予青年支援，幫助青年把握大灣區與國家發展機遇。只有打通青年向上流動通道，香港才能源源不斷培育人才，維持城市長遠競爭力。

就業與勞工保障，關係每一個打工家庭。規劃提出，市民就業收入中位數與經濟增長趨勢同步，持續保障本地勞工權益，拓展新產業，推動職業培訓，協助勞動力轉型，應對經濟結構轉變。香港正積極培育新質生產力，發展創科、綠色金融、新型工業等產業，新產業帶來新崗位。民建聯認為，經濟發展果實必須由廣大打工市民共享，經濟增長才能真正帶動民生改善，形成良性循環。

中小企業向來是香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支撐着本地大量就業崗位，亦是市場活力的來源，五年規劃亦提出不少針對中小企的支援部署，包括協助中小企加快數碼化與人工智能應用、拓闊融資渠道、幫助企業把握大灣區及海外市場機遇，減輕營運上的制度障礙。

必須指出的是，五年規劃是戰略指引與行動藍圖，是政府做好頂層設計，破除

土地、產業、民生方面的制度障礙，引導資源投向有利長遠發展、惠及廣大市民的領域，既扶持中小企穩健發展，亦培育策略性新興產業，發揮政府統籌引導作用，同時保留香港市場經濟活力，維持國際營商環境。這正是「一國兩制」下香港獨特的發展路徑，既緊扣國家戰略，亦保留自身制度特色。

團結一心把藍圖變為現實

我們希望香港社會團結一心，把握歷史機遇。香港經歷風雨之後，走進由治及興的新階段，有中央堅定支持，背靠祖國龐大市場，加上自身國際化優勢，配合五年規劃的系統部署，完全有能力解決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。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從來相輔相成：經濟穩定增長，才有資源投入住房、醫療、教育；民生得到改善，市民安居樂業，社會更加穩定，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。

民建聯始終堅信，香港發展的根本目的，是為七百萬市民謀福祉。香港首個五年規劃，把排解民生憂難放在突出位置，亦透過多項政策助力中小企業轉型升級、開拓市場，讓市民和企業都看到清晰的改善路徑，對未來生活與營商環境充滿希望。從房屋供應到醫療改革，由青年發展到長者安養，再到支援中小企業數碼轉型、把握灣區機遇，每一項舉措都回應基層、商界多年的心聲。我們將繼續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推進五年規劃各項工作，同時亦會積極反映中小企業的營運訴求，與社會各界並肩同行，凝聚共識、團結力量，一同把規劃藍圖變為現實，在「一國兩制」的堅實基礎上，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，建設一個安居、樂業、充滿希望的香港，讓全體市民與廣大中小企業共享由治及興的豐碩成果。

民建聯主席、立法會議員



專家觀點

近年，人工智能（AI）浪潮席捲全球，無論是企業還是公共服務領域，面對業務痛點時，最常見的直覺反應往往是：「不如用AI吧！」、「不如開發一個AI代理！」甚至「直接應用大型語言模型！」

然而，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推動及落實眾多AI應用項目的過程中，我們得出一個至關重要的體會：切忌「為AI而AI」。面對挑戰，首要問題不應該是「這裏該如何應用AI」，而是必須反思：「我們真正想解決的業務或公共服務痛點到底是什麼？」總結實戰經驗，成功落實AI轉型必須打破以下四大迷思：

一、工具越強不代表越合適：別用「打樁機」去釘釘子

許多業務問題根本不需要動用AI。舉例而言，如果一項工作僅需幾條商業規則或傳統規則系統便能妥善處理，為何要耗費資源去調動一個擁有數百億參數的大型模型？這猶如為了在牆上釘一顆釘子，而專門駛來一部打樁機。

企業必須明白，AI並非免費午餐。每次調用模型均牽涉詞元（Token）、算力與平台成本；模型越龐大，成本自然越高。此外，還需顧及系統整合、測試、網絡安全及後續維護。因此，首要原則是：以最簡單、最合適且成本效益最高的方法，去解決真正具價值的問題。

若傳統自動化能勝任，就用自動化；但若問題涉及大量非結構化數據、複雜語言理解及高階分析，這才是AI真正創造價值、值得大膽嘗試的領域。

二、重新設計工作流程，而非硬塞AI進入舊有系統

我們不能僅僅將AI視為一個外掛組件，硬塞入現有的工作流程中。管理者必須重新評估：哪些工作AI做得更好？哪些工作人類無可替代？

AI擅長高速處理海量數據、進行初步

分析、尋找規律及撰寫初稿。然而，當事情涉及同理心、深層商業判斷、豐富經驗，以至需要承擔最終責任時，人類的角色依舊不可或缺。

真正的價值並非「AI取代人類」，而是「人類結合AI，能否成就以往無法實現的創新與效率？」

三、摒棄「完工即止」心態，建立持續反饋機制

傳統的IT系統具備確定性——輸入A，永遠得出B。但生成式AI（Generative AI）並非如此

這意味着AI項目絕對不能「整完就算」。機構必須建立嚴謹的測試、量度與監察機制（Feedback Loop）：AI輸出的準確度如何？是否存在「幻覺」（Hallucination）？使用者是否感到真正受惠？實際節省了多少時間？創造了多少商業與社會價值？我們不應只問「這個AI系統能否運作」，更要問「這個AI有否實質推動業務或服務升級」。

四、堅守管治與問責：決策責任絕不可外判

隨着AI參與度提升，數據安全與管治（Governance & Data Security）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。機構必須清晰界定：AI可以讀取哪些數據？哪些屬絕對機密？哪些層級的決策必須經由人類審批？

最核心的底線是——無論AI提供了多麼詳盡的建議與分析，最終的問責（Accountability）絕不能外判予AI。AI只是提供建議的顧問，承擔最終責任的，永遠是我們自己。

總括而言，一場成功的AI轉型，本質上並非單純的「IT項目」，而是一場由AI驅動的業務與服務轉型（Business Transformation）。真正的贏家，是那些懂得洞察何處該用AI、何處不該用，知曉何時該信任演算法，以及何時必須堅守人類判斷的決策者。記住，AI只是工具，創造實質價值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。

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首席數碼總監

中美何以共同追求戰略穩定？



宋魯鄺

國際關係

2026年中美元首高頻度互訪，堪稱十年間雙方激烈戰略對抗中罕見的一幕。

這一幕既和特朗普個人因素有關，也同樣是宏觀因素所致。首先，經過十年的戰略博弈，美國已經清醒認識到不可能達到遏制中國的目標，不僅沒有一擊而成的實力，更重要的是中國也擁有相互保證破壞的能力和威懾力。對抗持續和升級的代價過於高昂，不符合各自利益。所以當中國提出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」理念時，美國予以接受——這在中美歷史上還是第一次。

其次，特朗普是商人特質的總統：注重利益和傾向於交易、不喜空談而迅速行動。面對啃不動的現實，他能毫不猶豫地轉向。如果是建制派，要麼繼續堅持原則，要麼轉向緩慢、艱難。像俄烏衝突雙方打成僵局和無底洞，建制派依舊不顧一切支持烏克蘭，特朗普則立即收手。

第三，今天的世界已經從冷戰時的兩極、冷戰後的一極進入到類似於19世紀的多極。大國之間的博弈不僅要考慮對方還要考慮第三方。

今天世界最重要的四大力量是中美俄歐。按說由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挑戰者，大力進行圍堵，中國的處境最為不利。但現實卻是俄羅斯率先反擊，處於挑戰西方的第一線。特朗普雖然從俄烏衝突退出，但又陷入對伊朗的衝突。所以當下地緣形勢中，中國處境最好：是唯一沒有捲入戰爭的國家。美國由於務實性和靈活性，次之。俄羅斯被整個西方制裁處境不利。歐洲同時和中俄美對立，境況最差。

面對這樣的棋局，中美為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，也不得不調整雙邊關係。簡單講，正如尼克松訪華時所坦率承認的：追求美國和蘇聯的關係要超過中國和蘇聯的關係，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也要好於蘇聯和中國的關係。這樣美國面對中蘇時都具有優勢。

從美國的角度，中美戰略緩和不僅有利於美國處理和伊朗的衝突，也使得它面對歐洲和俄羅斯時佔據主動。中國元首9月23日應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，結果在9月22日，美國就取得了歐洲的重大讓步：它和丹麥、格陵蘭島簽署了安全協議，除了主權基本滿足了美國的要求。特朗普為此在社交媒體上聲稱獲得

了「永久控制權」。

同樣並非巧合的是，9月18日，也就是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前五天，美國同時對俄、伊兩國出手：特朗普簽署了《2026年林賽·格雷厄姆制裁俄羅斯與伊朗法案》。對俄制裁升級：範圍覆蓋俄政府高官、主要金融機構、能源及國防工業。而且有兩個前所未有：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對所謂的「影子船隊」進行打擊；實行最高法定關稅上限，即對俄羅斯輸美產品徵收最高500%的從價關稅。對伊朗除將原有的《伊朗制裁法》有效期延長5年，還擴大對它能源和武器領域的制裁。

應該說美國把中美關係的戰略穩定效果發揮到極致。

從中國一邊來講，收益同樣是戰略性的。

一是當下唯一能阻撓中國發展的就是美國。雙方關係改善，來自美國的壓力和破壞力就減少，中國發展的成本和風險也隨之下降。二是中美關係保持戰略穩定，有利於中國和其他大國以及相關利益體的博弈態勢。

特朗普執政第一年，在和中國大打出手的同時積極努力改善和俄羅斯的關係，

試圖改變中美俄三角關係，也就是所謂的逆尼克松戰略。但最終卻依舊是中俄的關係要遠遠好於俄美之間、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也遠遠高於美俄之間。特朗普簽署對俄羅斯的制裁法案，既是借「中國牌」對俄羅斯施壓，也標誌着他所謂的「逆尼克松」戰略的失敗。

至於歐洲，它在特朗普再度執政後又一次成為美國敲打的對象。但由於俄烏衝突，歐洲沒有如同過去那樣對美國進行對等反擊而是採取了戰略忍讓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歐洲的戰略價值下降。同時歐洲認為中美矛盾是第一位的，中國必然會對歐洲進行戰略妥協，在這種判斷下，歐洲不斷升高雙方的對立。中歐關係實質上日益中美化。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，歐洲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障礙。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罕見的對中國下達了最後通牒：2026年10月如果不能在經貿商談上取得成果，就對中國進行全面報復。

所以中國和美國達至戰略穩定，既有利於中國和歐洲的博弈，也能讓美國對歐洲心無旁騖地進行打擊。從而實現如下戰略格局：中歐關係不好，但美歐關係更不好。中美關係能夠穩定，美歐關

係則繼續動盪。

其他類似的還包括日本、菲律賓等安全上依賴美國的國家。中美實現建設性戰略穩定，不僅強化了它們日益增長的對美國的不信任和疑慮，也使得這些國家不得不思考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面對中國，更重要的是當它們挑釁中國核心利益時，中國能夠給予痛擊。中國對日本近一年而且仍然持續的反制就是一個例子。

當然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角度，最重要的戰略收益還是兩岸統一。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坦率對中方說過：只有中美才能改變台海現狀。無非是說兩岸統一取決於中美博弈。中美實現戰略穩定不僅對「台灣」勢力是一大遏制，也是大陸進一步推動統一時機。特朗普執政一年多的表現，對「台灣」勢力有相當程度的釜底抽薪之效：美國不再可靠、台積電面臨掏空、加關稅和強迫赴美投資削弱經濟發展。

總的來說，美國利用中美戰略穩定四處出擊，中國則加速發展、優化外部地緣形勢、強化大國博弈中的地位、強力應對外部挑釁和推動統一。

旅法政治學者、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